

李成芳的“光荣战史”

李成芳，男，丑年五十八岁，家庭出身中农(?) 湖北省大别山麻城李俊河人。昆明军区政委，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南局委员，军管会主任，云南省党、政、军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司令。

一九四九年前后，李参加家乡游击队至编入十九团(元总率部，丑原昆明军区三十七师)，一九三五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并延安至窑洞。在红四方面军期间，他忠实追随叛党分子张国焘，是传的一员干将。一九三六年李刚调任团政委不久，便伙同少数干部竭力抵制和反对揭发批判张国焘，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七七”事变以后，大叛徒集团的总头目刘少奇指使大叛徒薄一波由闫锡山搞什么“统一计划”，领导建立了“新军”，成立了所谓“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其核心为闫锡山的嫡系部队)，并控制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为闫匪官办，简称“牺盟会”)，长期为闫锡山出力卖命。

一九三八年三月，太原沦陷后，李成芳、苏鲁、蔡俊卿、黎锡福等由八路军秘密派往“决死队”，李担任第一纵队第一总队队长，一直紧紧追随纵队长梁龙哉(反动军官)、纵队政委薄一波(大叛徒)，为大叛徒薄一波、朱佩琮、王鹤年、周仲英、刘有光、廖鲁言、胡子明、胡崇炎等继续为叛党，忠实执行刘少奇投降主义路线，停止决死队内党的活动，为蒋介石、闫锡山的反共高潮作舆论准备。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闫锡山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开办一个“校尉军官训练团”，训练“决死队”营级以上军官，由闫匪及共高级官员亲自训话，灌输反共思想，进行思想奴化，实行软化收买，特别是灌输闫匪的反动“二元论”哲学及共反共反人民的思想，为闫匪培养造就忠实走狗和得力打手。李成芳、傅翼天(一总队二大队队长)、白玉棋(一纵队游击一团团长)等参加受训，结果都被闫锡山用封许愿、金钱美女所收买，成了可耻的叛徒。

当时，闫锡山看到李成芳一贯投机取巧、贪生怕死(素有“李怕死”之称)，便好几次找李成芳“谈机密”，封他大官，给他一千余元大洋，

并施用了美人计。李叛变后，闫向李布置任务，给李一本电报密码，直接由闫秘密联系。

受训完毕，李成芳直接受了闫匪给他们的特殊任务，便途径西安回山西，沿途用闫匪给他们的金钱，大嫖妓女，李从此染了一身梅毒。途中李、博曾公开无耻地说：“在决死队不干这些日子（指嫖妓），云来到了西安，可以干了。”博还对李说：“回者干不成，就干脆回西安。”^{博回西安}博公开投敌反共。二十九年春，李本性不改，不得不一直往西。四二年，决一旅旅长李聚奎同李成芳同居，曾因吃了李洗梅毒的药而中毒，吓得保卫部长肖定楚从楼上摔下来。

回到决死队不久，叛徒白志琪向闫锡山发秘密电报发现后，便公开逃跑投敌，李成芳反共投闫同时也被揭露出来（据说他曾向闫锡山发过秘密电报）。当时，为维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为维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就要就地枪毙石化他，逮捕他的又叫刘先生（现在还），竟日从他身上搜出了密码。博一波怕叛徒集团的老巢全部被捣毁，便以老上司的身份委任李成芳，把李要下来亲自处理，并扣有关材料档案。在李行也工作期间，博就把李送到太行专署保安司令部茅团黎锡福处“休养”（李与黎是同乡，而黎又是保五团团长，又是八路军派到决死队的骨干，政见鲜相同，私人关系好），名誉上给李一个决一纵队参谋处处长职务，实际是进一步对李进行收买工作。就这样，李把电报密码一本白文给了博（后被博烧毁），演了一个“一仆二主”的丑剧，李完全投靠了博。就这样，在博一波的包庇下，李以“急病了”“交待了”“回山西王府的革命路上来了”为幌子，逃避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惩罚，免于枪毙，而且还青云直上，不久就当上了决一旅行旅长，十一旅旅长（决一旅→十一旅→十四军四十四师）与叛徒周仲英（决一旅政委）、刘有光（十一旅政委）、胡葆贵（十一旅政委）和章俊王砚泉（该旅参谋长）、博克（该旅政治部主任，北云西省二文政治部主任）共事。当时黎锡福为十三旅付旅长。而博一波天则在1939年“十二月改变”后，便公开逃跑投敌去了。66年博一波曾经说过：“有些老干部，被闫锡山收买，接受了闫锡山的密码，金钱，后来投降了，还是好同志。”这完全是叛徒哲学！

在解放战争到达最关键的时刻，李曾多次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军事路线，大肆攻击和谩骂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赓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拒不执行命令，曾多次在电话中大骂：“妈的老子不干了。你枪毙我好了！……”

云南解放后，李成芳担任十四军军长时，为了个人享受，竟无视党纪国法，依于承钰（现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到香港采购私货，破坏我国荣誉。不仅如此，还玩弄女性，大兴土木，无恶不作，企图把云南变成“决死队”统治的独立王国。

1952年，李到成都华西医院治病，劣性不改，强姦一女护士未遂，挨了两耳光，怕于情愧，忙掏出一叠人民币进行收买，遭到严厉的斥责，不久李便调任十五军代理军长，他曾不满地说：“就那么一点子（指强姦女护士一事）就不得了啦！”

不久，李便调到朝鲜战场，忠实追随彭德怀，作战失利，对党对人民又欠下了一笔血债。回国后，在南京军区院校学习出来，调任武汉军区付司令员。

54-58年，十四军四十师师长果忠玉（山西人，富农出身，父亲极为反动）从苏联学了一套修货回来，因为“决死队”大部分骨干都已聚在云南，便去找李成芳密谋到云南，企图依靠决死队在云南大搞独立王国。当时，果曾送李一台600余元的电视机。

1959年，谢富治同志调离云南后，金如柏又生病，昆明军区缺政委（当时陈康与秦基伟矛盾很大），于是，贺龙、罗瑞卿、萧一波、彭真趁机给胡荣贵、王砚泉、秦基伟作工作，63年以“加强云南”为名，把李调到云南来了。当时，罗担心李一直搞军事，没当过政委，怕出

这些家伙到云南来，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而是推行非法的“吕正操思想”。由铁道兵付司令员郭维城出面，李井泉幕后指挥，召开了一个黑会，刘少奇打电话祝贺，把修铁路的民工改成铁道兵，又把铁道兵改为第一解放军，加紧征兵工作，秘密的向山区，向边境修筑铁路，妄图政变，篡军篡政。

六六年三月，李成芳随同篡军大头目贺龙、廖汉生（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等乘军用飞机，到新疆活动。

这里，我们还得简单提一提李成芳和张子昀的关系。张子昀叛变出狱后，在薄一波、李成芳手下任决死队二十五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初，任十四军四十二师付政委。六四年，张借口军工要转为地方院校而到国防科委胡闹，要求调到昆明军区与李同事，已征得李成芳、秦基伟的同意。六六年四月，文化革命初期，张子昀志到在哈军工实在混不下去了，便经过刘、薄叛徒集团的精心策划，于七月廿四日调往昆明，做李的左右手。六六年五月中旬，李、张、胡等叛徒云集薄一波处，开黑会，订“攻守同盟”，对抗文化大革命。

六六年八月下旬，李便伙同秦基伟、王砚泉等从右的方面介入了文化大革命，残酷镇压砸烂。

六六年十月，李再含同志揭发贵州省委问题，李成芳、秦基伟等人便勾结三反分子贾启允迫害李再含同志，将李再含同志召到昆明军区围攻了一顿，并要强行把李再含同志调回昆明。曾受到陈康的竭力反对。李后又向中央拍了一个颠倒黑白的电报，把李再含同志打成反革命。当中央批转关于李再含同志揭发贵州省委问题的文件下达后，李成芳等人私自把它扣压起来，不往下传达。又通过王砚泉转告闫红彦，保证昆明军区党委不揭发省委问题。（黎锡福也保证云南军区党委不揭发省委问题）。

六七年一月，李成芳、秦基伟等人竭力劝阻闫红彦等人出来见群众，十日张子昀等人制定了武装镇压驻昆明军区大院的革命造反派计划，李特意从北京打电话来表示全力支持。闫红彦叛党自杀后，又大肆

污蔑红卫兵小将，把红卫兵打成“暴徒”“反革命”，并为自政委开追悼会，与中央大唱反调。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一手制造了二·一四武装镇压事件。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搞了一个反革命的“三凑合”，把两西派周兴、山大三“郭超，三十四平的大叛徒此平、蒋孝光、国民党宪兵三团的骨干、决死队骨干薛翰捧上了有工农领袖地位的宝座，把决死队的优秀青年王传安捧上《云南日报》副总代表的宝座，把周力、戈力、赵增益捧为“三结合”的对象，并复活了薛波（决死队）这具快死的政治僵尸，利用《云南日报》大肆放毒。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秘密要决死队的××和××谋杀了刘林元后，又蓄意制造国际了端。（详情暂不公布）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一手炮制了海天炮兵团的四线作战计划，以及反动的六条规定和三条规定。（见评论员文章）

四月廿五日，李成芳对他的秘书说：“八二三是一定的左派，要坚决支持，不能动摇。炮兵团有缺点，要帮助。李毅这个人很坏，要把他干掉。”又说：“炮兵团只有七个组织能够支持，特别是海天炮兵团要支持。”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一手制造五·二九血案之后，竟狗胆包天，把五月廿日中央来电，偷之删掉了157字（字数可能有出入），并对李再会信德的来信极为不满，叫嚣什么“李再会就是李再会，李再会不是党中央，李再会死得和我汇报。”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一手炮制了触目惊心的三月兵变”这一特大毒案，重要任王祝泉上京谎报军情，策划逮捕借刀杀李同志，意图搞反革命的策事改变，被毛主席和林付主席识破，未得逞，并派谢付总理、三万同志等到昆处理有关问题。

李成芳、张子明等人干了一系列罪恶勾当之后，至今仍负隅顽抗，不老之实之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

这样的大叛徒、反革命，此时不打倒，更待何时。
打倒李成芳！打倒张子明！打倒刘涛叛徒集团！（内部传阅）
《共宣》“痛打落水狗”战斗队。步救“革联”翻印。 64

李成芳六月廿九日的检讨(内部传阅,不外传)

首先感谢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谢付总理、王力、空军政委、李再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天怀。谢付总理的指示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教育很大，坚决拥护，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特别是现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自己觉悟很低，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一月廿一号前站错了队，支持了保守派，保了白红专，省委支左以来，单是我个人主观上，是坚决支持云南两大左派的，是站在左派一边的，但具体工作上犯了错误。对昆明上的错误，特别是对张力雄、林家璧和云南军区广大指战员的错误，十一月廿一号的报告是错误的，要收回，主要导火线是五、十七的斗争群众。认识到错误在云南军区，这是反映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错在我。云南军区的广大干部要王砚泉解答问题是群众的意见，我们是很不理解。当时我们就上报。五月廿一日向中央发的电报，广大革命群众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我没有按中央指示办事，把矛头颠倒过来了。认为是给昆明军区党委唱对台戏，对云南军区不信任。从而各方面收集材料，组织起来学，名为统一思想，实把矛头指南云南军区，揪王砚泉到北京，主要是反映情况，看揪、斗、还揪、斗、批左派在军区工作，这样做是打击了这些同志。这样处理会把这些同志打成赵永夫，而且也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而没有把矛头指向我，这是很大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当百尚张立雄、朱家璧、王银山、李明承认了错误，道了欠，态度比较诚恳，便立即停止了云南军区的学习。黎锡福错了，根子在我，但应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广大革命群众整的材料批评我，不应对准昆明军区党委。“五月兵变”是我错误的看法，使八、二、三收集了一些不正确的材料，指向人民解放军，这是我的错误，影响了地方两派的斗争，属级军区的矛盾处理好，对两派的团结是会起作用的。

二、对两大派的态度

两大派都是左派，中央文革承认的，广大指战员承认的，广大革命群众是承认的。四月份我是支持两派的。通过“五、二、三”“二、六”封

团《云南日报》。国民党军区大败，处理犯了错误。对砲兵团的保守
组织、堡垒阵地、看砲团兵的多、少的，对形势大方向掌握不好，
把错误办法上报中央。砲团对军区，对我军相仗是砲兵团的，客观
上我是支持了八二三，支持（死文如此）了砲兵团。我六月十一日报告
是有错误的，影响了两次派的团结。我过去认识不足，现在认识了。
对《云南日报》不夜革命山宿志公为，是革命小报的意见。对子封
《云南日报》看报是守守夜的权，是方向性的错误。这个公为是错误
的。对那封仗并不多通姓（指给李敬、李湘的公开仗）、矛头对准革
命小将是错的，应收回去。八二三是一派，砲兵团是另一派（前
两旬说地）中央不姓我一派，李制一派，而我们实际上是我一派，李
制一派（八二三在砲兵团），制止武斗我们处理不力。主要是没
了毛主席东思想伟大红旗，对砲兵团的意见听不进去。总的说来，是
压制了砲兵团，说路没穿支持八二三，云南军区支持砲兵团，说云南
军区我一派李一派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找八二三打砲兵团。

六、作风问题。

李制对中央对我的信任。这次检讨不行，今后还要检讨。由于我
长期在正路意见听不进去了，不正确的意见听进去了。长期以来表
示作风不好，这则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毛主席东思想伟大红
旗不够。这是我初步的检讨，今后希望同志的帮助我检讨，但我也认
识到了。

七、今后我的打算

今后我的打算。是按射付总理的指示办事，相信省军区党委，掌握斗争
大方向，团结一切力量，斗真，斗倒党内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
邓陶，云南主要是同红秀的流毒，打好大联合，军师也要打好大联
合，对保守组织要改组上认识过来，正确对待站出来的革命干部，观
点是按毛主席同志指示“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块”的教导办事，加强
两级军区的团结，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大胆听取正反面的意见，大
胆向群众承认错误。

春城老百姓翻印。6月20

云南老勒黎设计院毛泽东思想“五、一六”战斗团“斗、私、修、反”

7月1日

李成芳是毛主席司令下的人吗？

1. 1939年，同锦山于秋林集训干时，李成芳被同锦山所收买。同锦山给李成芳三电话密码，叫李成芳直接跟同联系，汇报我军的军情一切情况。同锦山还给李成芳许多钱，李成芳拿着这笔钱到西安嫖妓女，从此染上梅毒。李成芳回中秋后，即把同锦山给他的电话密码交给同锦山。李成芳跟同锦山都是八路货色。李成芳说过：孙雨亭是个好同志。

2. 李成芳来云南后，便将自己“决死队”里的人马（赵守义，戈方，赵善卿，傅克，任大伟，雷虎云）安插在各重要单位任职。李成芳跟张子明，胡崇贵，王砚泉等人十分要好。李成芳还用他的钱买自己的小房子，并要求坐好的小车子。除此以外，还专门派人到香港给他买回大量英国的香烟。

3. 1952年，李成芳去朝鲜参战回来，在成都调戏女服务员而遭到女方一个响亮耳光的回击。这时，李成芳就拿去六毫一钱给女服务员，女方却将此钱摔到李成芳的脸上。

以上事实提供读者们分析，李成芳到底是哪个司令下的人？

昆明医学院毛泽东思想“三·七”炮兵团《抓叛徒》小分队 1967.7.

最高指示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来人民去打倒他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帚一样，扫帚不倒，灰尘也不会自己跑掉。”

